

#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时代性与超越性\*

戴长征 曾思捷

**【内容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结果。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中国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深入挖掘和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中国外交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具有时代性和超越性两个主要特性。习近平外交思想还是对世界之间、时代之间的深刻回答，回应了百年变局下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国家安全观、全球治理等进行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阐释。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年变局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戴长征，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 邮编：100029）；曾思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29）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2)05-0028-16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205002

---

\* 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以及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中国之治’及其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根据2022年4月2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广义国关学科建设和时政研究的指导意义”学术研讨会以及2022年5月20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举行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与中国国际问题三大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拓展创作而成。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经验、智慧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方案。习近平外交思想必将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 一、深入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

外交思想是指在对外交基本问题进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外交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系列基本理念、观点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提出者和创立者，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有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工作经验，对百年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着全局性、整体性的把握，对世界何去何从的世界之问、人类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有着深刻理解。在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这一重要概念。

### （一）倡导和合共生的国际社会文化

在吸取一战、二战的惨痛教训后，国家间的社会性互动日趋频繁，世界各国在地区和全球层次的对话、合作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与集体规范，和平与发展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文化观，国际社会根植于共同的文化或文明。<sup>①</sup> 国际社会文化是连接国际体系各政治实体的核心要素，能对审慎原则、责任感以及其他管理国际社会的无形规则进行管理、调整。国际社会文化不仅有助于增强国家间的合作与信任，而且有利于加强各国对国际体系破坏行为的后果预期，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共建国际社会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底色，“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和实

---

<sup>①</sup> 杨庆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6页。

生物”等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代表万物共生的和谐状态，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相互影响、和睦共处，尤其是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彼此包容的互动，主张人类在价值追求、交往规范上具有类本位的相通性。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把握了人类这一本体共通性，从而能够使以和合共生为支点的国际社会文化反映人类彼此联系、彼此影响的本质，也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能够回应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诉求。

### （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习近平外交思想放眼世界，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以对物质生产与劳动分工的分析为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动因和趋势进行了深入考察，体现出关切人类自由、解放的强烈价值追求。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世界历史演变的规律有着深刻把握，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前进上升的，发展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以此为基点，针对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论断，进而指出，百年变局带来的挑战反映了世界历史前进的曲折性，但困难是暂时的，困难与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正是在这样的科学判断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一带一路”等重大理念、倡议等，做到了积极有为，主动作为，实现了“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sup>①</sup>。

### （三）广泛吸取新中国外交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智慧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通过“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与会国家的广泛认可，如今这些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积极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给予亚非拉国家大量无私援助。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明确南北关系问

---

<sup>①</sup> 任理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人民日报》2022 年 6 月 2 日，第 1 版。

题的中方立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合法权益。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国际社会倡导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核心是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则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倡导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在一个国与国之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时代，谋发展、求和平、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坚持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是对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和理论创新。<sup>①</sup>

##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重大论断彰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于社会主义道路再创辉煌的时代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社会主义道路再创辉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全面崛起的事实彻底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挫折、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所谓“自由、民主已经胜利”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愈发彰显了其世界意义。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四十多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

---

<sup>①</sup> 戴长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8日，第1版。

脱贫困，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sup>①</sup>这一成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格局，也催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在国际关系史上，传统的外交规范和行为讲究运筹帷幄、多方斡旋。特别是传统外交往往只作为战争爆发后各方讨价还价的手段或是作为军事行动的辅助措施，外交只是一种工具、手段，不具有价值意义，遵循的是工具理性原则。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外交的工具理性逻辑，其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理念表明，外交不仅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手段，而且应该承载实现人类对美好价值追求的使命。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这一高远境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求大同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百年变局的有力回应

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sup>②</sup>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新的世界变局和国际关系变化的有力回应。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不断变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及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等事实。上述变化表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制度方面的优势正日渐丧失，相对优势的下降已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傲慢心理遭受重挫。根据“挫折—攻击论”，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正使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旧有的权力政治思维和地缘政治逻辑，<sup>③</sup>它们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对他国进行政治渗透和干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诸如科技水平悬殊、南北差距、数字鸿沟等因素也成为百年变局中不可忽视的变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新兴市场国家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群体性崛起，但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持科学技术的绝对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① 颜旭：《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世界意义》，《解放军报》2021 年 5 月 21 日，第 7 版。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21 页。

③ 尹继武、刘训练主编：《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0 页。

家筑起技术壁垒，压制非西方国家的技术发展向中上游水平提升。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方面的压制使数字鸿沟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也使本就严峻的南北差距问题进一步恶化。时至今日，全球仍有不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匮乏等问题成为恐怖主义、毒品泛滥的温床，世界和平发展亟须全新的智慧与方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百年变局作出了有力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将“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主张全世界人民“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sup>①</sup> 其思想基础是中国儒家倡导的大同社会，而在这一大同社会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全体成员将结成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共同体。

百年变局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独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号召世界各国人民面向未来，在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相互包容、调试彼此的差异与利益冲突，将资源和精力专注于国家间具体问题的协商解决与实际行动上。经验表明，当今世界发展正处于现代性思潮占主导、后现代性思潮逐渐涌现的时期。现代性思潮强调民族国家、主权规范以及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注重宏大的历史叙事，强权思维就是现代性思潮的反映。后现代性思潮作为一种反思、批判的思潮，在主张过程化和多元化的同时，也消解了现代性赖以依存的确定性世界观，但没有提出具有指导性、建设性的理论方案。<sup>②</sup> 由此可见，作为在西方率先兴起的社会思潮，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的，都不能回应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上有助于克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内部矛盾及其之间的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以更开放的思想去包容彼此。寻求认同与归属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当某族群的集体认同遭遇其他族群认同的威胁时，冲突就会发生。但经验同样证明，集体认同的冲突并非不可克服，其解决途径就是构建更高层次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为世界人民提供新的集体认同，这就超越了传统的国家理性和族群意识，也为

---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33 页。

② 魏玲：《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外交评论》2017 年第 1 期，第 51 页。

从根源上解决因民族、文化、族群等认同而引发的冲突提供了思路，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因而成为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中国方案。

###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回答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关键阶段，产生于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复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日益迫切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及时回应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其核心要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中国，中国要始终与世界携手同行。

第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回应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两大根本问题。一是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能保持 GDP 的持续增长，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艰苦奋斗，持续不断地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不仅要实现自立自强，而且鼓励、支持其他国家实现自立自强。2013—2018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 4 000 亿美元。<sup>①</sup>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本着对世界人民生命健康负责和与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截至 2022 年 5 月，中国已经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2 亿剂疫苗，并将继续向非洲国家、东盟国家分别援助 6 亿剂、1.5 亿剂疫苗。<sup>②</sup>中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二是人类应该何去何从。纵观世界历史，猜忌、竞争、强权、战争只会给世界人民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国际政治一度成为强权替换强权、强权打倒强权的游戏。但是事实证明，新的仇恨不能解决旧的仇恨，仇恨与猜忌只有通过包容、理解、开放才能真正化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sup>③</sup>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在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021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强

① 《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属于世界》，《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23 日，第 3 版。

② 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进一步开拓对外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16 日，第 6 版。

③ 韩震：《深刻认识和把握大历史观的哲学意蕴》，《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1 日，第 7 版。

调,“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sup>①</sup> 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高度一致,凸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性与超越性。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国家间互动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主权平等原则是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主权规范关乎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与民族尊严,不容任何行为体以任何方式进行践踏、侵犯,有关主权规范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理应受到彼此尊重。新型国际关系同时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主张在坚持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国际制度和规范应由各国共同商议,国际合作应由各国共同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享。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旧的国际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替代性的互动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新的崛起国替代霸权国、新的霸权国又被再次替代的故事往往重复上演。而合作共赢是对传统“替代式”国际关系的超越,它强调各国在合作的过程中通过理解、包容、对话去化解各方的猜忌与不信任,探索各方共赢的具体行动方案。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又是以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宗旨。在盛行丛林法则的国际环境中,国家只有通过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现实主义路径实现国家的生存、发展,国际关系往往表现为零和博弈或赢者通吃。而只有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才能得到保障。

第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长期以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式治理的理念、规则、制度和规范占据主导地位,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发展中国家倡议的治理实践则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排挤。在西方主导的治理格局下,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红利远不足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为融入全球化而付出的代价,诸如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劳动力受到的大规模压榨等。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不能以牺牲一方利益来成全另一方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习近平外交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主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应在全球治理规

---

<sup>①</sup>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82页。



则、规范中得到充分体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顺应时代潮流，使其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世界之间、时代之问的深刻回答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国际关系性质、内容和特点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些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国际关系现象中。首先，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逆全球化浪潮兴起。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供应大量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中低端技术等要素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的红利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长期失衡。其次，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产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文明之间展开了对话与沟通，甚至在一些共同价值追求方面产生了文明互融。然而，一些西方国家试图用单一的文明标准界定一切，对其他文明强行实施改造，引发了文明间的冲突。再次，和平与发展在成为时代潮流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在霸权思维的驱动下，美国联合盟友在全球范围内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使原本处于比较正常互动状态的中美关系遭受严重冲击。最后，在传统安全威胁未能消除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又不断增多。跨国公司在侵蚀国家主权的同时，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也持续肆虐，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到且应得到正确回应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世界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面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局性、历史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就成为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回答了上述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并指出根本出路就是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思想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任何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行径只会不断挑起、激化矛盾，只有合作共赢才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正道。任何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威胁都可能转变成为本国的挑战，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共同行动，才能真正切实、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因此面对全球治理问题，根本上在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对于文明多样性，各国也要坚持交流互鉴，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彼此的差异性。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面对和平发展问题，

各国更要坚持合作共赢。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样的认知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国。同时，各国要做到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只有“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sup>①</sup>，世界才会迎来光明前景，人类才会赢得美好未来。

###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超越性

近十几年来，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逐渐出现新的变化，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民粹主义抬头、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等现象表明，既有的外交理论与观念难以指导当今世界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亟待新的思想来引领，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对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全面超越了传统外交理论与观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 （一）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西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虽然逻辑起点不同，也都有合理成分，但均存在片面性。这些理论不能全面回答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面临的新问题，更不能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现实主义理论过于强调人性消极的一面和生存利益的绝对性。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国家之间为了绝对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必然将处于无休止的相互斗争中，各国的资源和能力不可避免地大量消耗于国防开支、军备竞赛甚至战争，世界的和平发展将难以保障。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国际体系物质结构的客观存在，虽然认为国际制度的原则、规范可以降低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合作，但其观点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之上。实际上，国际合作中的成本和收益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基于理性选择的国际合作难以长久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亚历山大·温特提出的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存在观念结构，在国际体系中，施动者的互动与国际

---

<sup>①</sup>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体系的结构是互构关系。但是，这一理论对于观念塑造的具体产生过程与作用机制缺乏细化分析，例如，它无法深入回答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参与并未改变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规则。此外，诸如较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也并未提出建设性、完整性的理论方案，其研究案例也不具备广泛代表性。可见，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需要具有时代性、超越性的理论方案。

新型国际关系思想超越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物化分析和结构化分析，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事实上，无论是国际社会的物质结构还是观念结构，都忽视了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互动的多元性和过程性。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是完全单一的，在地区和次地区也并存着不同规模、交错重叠的结构，而这些是难以明确辨别的，何况地区发展进程还与该地区内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息息相关。国家间的互动不一定能够达到影响结构的程度，多数情况下只会通过改变国家间的互动预期影响地区发展进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充分发掘了和合共生思想的精髓，从而扬弃和超越了各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人与人相处于能够包容差异、理解差异，通过社会性的互动与情感联系去化解差异带来的分歧。国家之间的相处也理应重视国际互动的多元性和过程性，应该具有人类主义情怀。因为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物质关系或利益关系，而且作为人类本体在情感与价值追求上有着共通性。可见，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境界超越了西方狭隘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各国聚焦共同利益、全球公益，尊重文明多元性与利益多样性，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倡导各国要以合作共赢的国际与地区实践为基础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中国不但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与沿线国家携手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1 年 1 月，中国同 46 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sup>①</sup> 截至 2022 年 6 月初，中国已与 149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

<sup>①</sup> 《和音：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升级》，《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11 日，第 3 版。

件。<sup>①</sup> 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切实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

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本身存在多重逻辑矛盾和悖论。西方发达国家不顾各国人民的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向他国强行输入西方自由、民主，以单一的普世价值标准强行改造他国政治制度和干涉发展道路，这本身就违背了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理念。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类似的所谓“改造”失败后，被“改造”的国家又会转而成为恐怖主义、极端宗教思想和毒品泛滥等问题的受害者。事实证明，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给各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深重的灾难，也给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增加了严重不稳定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但不予以认可，反而视为威胁和隐患。这充分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边享受着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一边打压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其所作所为具有明显的双重标准，是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践踏。

与美国和西方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人民在价值追求上的共通性，认为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是互相成就、互为因果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不是西方的专利，不能为西方所垄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方式也是多元化的、有差异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合，共为一家”等观念，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换句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鲜明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突出了“仁爱”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祥和，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

---

<sup>①</sup> 陈尚文、李欣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人民日报》2022年6月30日，第6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类思维”(一种思维方式,是对于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分裂或异化的‘物化思维’的超越),从而实现了对人的具体把握。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类思维”体现出人作为“类存在物”,可以超越物种间的区别与界限,从而同其他物或其他人建立起本质的一体性关系。另一方面,“类思维”又体现了人的“自由自觉”本性,即人与其他物或其他人之间建立的内在一体性关系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建立起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各国视为命运与共、平等互利的主体,而非仅以狭隘的自我利益为中心并为此争夺权力的行为体,且关注到国家间各层次、各领域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现实。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等传统上描述国际关系的概念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家间分歧等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强调各国和各民族的命运日益成为一个紧密整体的事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正确义利观,实现多赢、共赢。大国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充分照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从而推动国际关系向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sup>①</sup>

### (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西方安全观的超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中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sup>②</sup>这就从根本上与西方的安全观划清了界限。西方安全观是以军事同盟、武力威胁为主要方式,配合以经济制裁、政治围堵等手段谋取霸权和强势地位的安全观,实质是零和思维的安全观。但事实是“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

---

<sup>①</sup> 戴长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8日,第1版。

<sup>②</sup>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15日,第9版。

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sup>①</sup>。安全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安全，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单边安全。因此，世界各国期盼的是要共同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sup>②</sup> 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全球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主张辩证地看待国家安全，要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统一起来思考。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推进，商品、贸易、信息、人员等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安全隐患。当今世界各国对现代观念有着基本共识，如民族国家、主权规范、生命财产安全等，在共同理念的影响下，安全事件的发生更易使人们感同身受，人们也会不自觉地预测同类事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可能性，放大对安全隐患的担忧，从而形成社会的集体安全焦虑。事实上，国家安全的保障离不开国际安全，国际安全的维护也离不开国家安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sup>③</sup> 从内部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是安全的基础，同时要认识到安全范畴已不再限于高级政治领域，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民生的保障、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都与安全息息相关。这些都是落到人民生活实处的安全问题，只有公民的安全利益与诉求都得到切实保障和全面关注，才能真正体现国家安全的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

#### （四）中国特色全球治理是对西方全球治理的超越

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我们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sup>④</sup> 西方的全球治理是强

---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3页。

② 杨迅：《7年来，中国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人民日报》2021年5月21日，第3版。

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④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2022年4月2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422/c1024-32405432.html>。

权政治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延伸，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话语权基本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西方的全球治理实际上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其本质是以资本的无限扩张为目标。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西方国家在治理规则制定、治理议程设置中为其大开方便之门，以各种方式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贸易领域作出牺牲和让步。考虑到这一点，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改革不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中国方案，这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针对性。这一方案主张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别国的发展利益为代价，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享。事实上，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在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安全等议题上都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2017 年，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纳入其中。<sup>①</sup>

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为全球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主观上，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为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国积极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还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抓手，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助于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繁荣发展具有持久、深远的意义。

## 结 束 语

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历史、全局的高度把握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运动方向，回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和世

---

<sup>①</sup> 王迪、朱玥颖：《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7 日，第 3 版。

界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习近平外交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人类主义一脉相承。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蕴含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转化的重要原理。总体国家安全观揭示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反映了中国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一贯立场。习近平外交思想把继承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使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焕发出新的光彩，实现了中国外交理论的重大飞跃。习近平外交思想准确把握住了万物共生的世界本质，形成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取向，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将促进世界共同繁荣、进步作为前进方向，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兼济天下的胸怀，深刻反映了在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和愿望。

[责任编辑：杨立]